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宋文

雷恩海 王廷鹏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雷恩海 王廷鹏 著

宋文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宋文 / 雷恩海,王廷鹏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11-04257-8

I. ①故… II. ①雷… ②王…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宋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440 号

策划编辑 张 仁  
责任编辑 张 仁 王淑燕  
装帧设计 张友乾

---

|      |                                                                 |
|------|-----------------------------------------------------------------|
| 书 名  |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宋文                                                     |
| 作 者  | 雷恩海 王廷鹏 著                                                       |
| 出版发行 |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
| 电 话  |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br>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onbook.com.cn">http://www.onbook.com.cn</a> |
| 电子信箱 | <a href="mailto:press@lzu.edu.cn">press@lzu.edu.cn</a>          |
| 印 刷  | 白银兴银贵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mm × 1020 mm 1/16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167 千                                                           |
|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11-04257-8                                          |
| 定 价  | 21.00 元                                                         |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学海无涯乐作舟

###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序言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次又一次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



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曰“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



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



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利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



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紫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



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衷。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注解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妪传》、《姚平仲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



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祐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祐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自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一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曰：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祐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释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庆振轩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 前 言

时逢“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论述文章的价值时，鲜明地提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并且感慨于人的生命有限，富贵荣乐及身而止，唯有文章可以流芳百世，亦足以使人之声名传之久远。作家是伟大的，既不需要倚凭历史学家之记载，也不需要依附于达官贵人之权势，而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懈努力，辛勤创作，获得千载声誉：“是以古之作者，寄声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因而，有志之士，皆爱惜光阴，珍惜时间，惧怕时间之白白流逝而一事无成。可惜，人们往往不能辛勤努力，奋发向上，贫贱时为饥寒所困扰，富贵时为逸乐所荒殆，致使时间流逝，光阴虚度，至死而不悟，岂非志士仁人之大痛哉！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文心雕龙·序志》篇指出：人有智慧，乃广袤绵邈的宇宙间最出类拔萃者——“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可惜人的生命又是脆弱的、很有限的——“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唯有文章，可以使人之思想、事业传之久远，因而君子处世，很重视“树德建言”——树立道德之高标，且以文章而流芳百世，促进社会之发展、文明之兴盛。

文章是人之生命的外在表现，又能够记载人生、社会事件，表现丰富多样的情态，便于交流思想、传播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兴盛。文章的作用很伟大，按照刘勰的说法：



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即：礼乐文化凭借文章而成就；国家的典章制度，亦需倚凭文章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皆需文章以沟通、且成就其斐然文采；军国大事，亦需文章使之明白昭著。显然，刘勰是从大处来探讨文章的功用的。当然，文章也可以写人的情感、思想、生命体验，也可以记述所经历的事件、游历踪迹、朋友交往等等。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物质两大层面上的所有活动，皆可以为文章所记载，且传播后世。

文之起源甚早，和诗是最早出现的文体，几乎不分先后。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先有易于记诵的诗，其次有散行的文，不过，在文字兴起之后，诗与文应该是同时兴起的文体。甲骨文出现的诸多卜辞，既象诗，又象文，或者说是诗文未分的混沌状态。从字源上讲，“文”之意义是极其丰富的：文，错画也，交错的图画，即文采，文章；言乃生民之音，即人口头所发出的自然语言。可见，言与文是不同的，文与言是语言的两种存在方式——言为口头语，文为书面语。扬雄《法言·问神》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形于言，心画形于文，方可表达思想。刘熙《释名》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梁元帝萧绎《金縢子》说：“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也就是说，文章需要精心结撰，美观而有韵致，有足以动人的情采，才能达到文章所欲发挥的力量。因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

诗文既分之后，文又有骈散之别。骈文，又称骈俪文（骈、俪，皆指偶对），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辞赋以及民间谣谚所惯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排比、对偶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东汉以后的建安时代，兴起骈体文，重视对偶、抒情，注意辞彩的华丽；至魏晋南北朝，骈文形式之精密，辞采之华丽，用典之繁密工切，声律之谐畅，踵事增华，日益发展。

骈文的正式命名，大约在唐代以后，清代始盛。盛行于六朝之时，并未有骈文之名称，梁简文帝称之为“今文”“今体”，以与传统的秦汉以来的散体文相区别。至唐代，柳宗元《乞巧文》说：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指骈文之用典工丽,对偶精巧,就其句式而言,一般为四字句、六字句相对偶,遂有骈俪、骈体之称,而至宋代,则一般称骈文为“四六文”,直接标明其句式特点了。骈文之文体形成于六朝,但是骈俪之句式则早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存在。骈散乃自然而生,未有优劣之别,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文谱》中说:

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

骈散相间,既有文气之流畅自然,也有文体之凝重,不可偏废。

古代文章,从对偶与声韵来说,分为骈文、散文两大类。就文体而言,类别甚多。曹丕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四科八体,其中七体为文。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狂。”十种文体,其中九种属于文。萧统《文选》诗文兼收,共分三十九类,除诗外,其余三十八类皆属文。《文心雕龙》论列各体文章,仅篇名所列文体即达三十四种,除《明诗》《乐府》两篇而外,皆为文;而所论述的文体达八十二种之多。宋初编纂《文苑英华》,收南朝梁至唐代的诗文,分为三十八类,除诗、词外,其他亦属于文。具体而言,各类文体大概有:

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传、论、说、诏、策、檄、移、制、诰、册、誓、令、教、章、表、启、议、问、对、书、记、笺、奏、疏、符、状、简、约、原、辨、解、释、序、引、判、露布、批答、封禅、题跋、连珠、杂文、谐谑,等等。

文章之作用如此巨大,范围又如此广泛,那么,如何阅读文章呢?

写文章,是要将作者的认识、思想、情感、体验,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表述出来,阐明其宗旨;同时为了能够比较准确、深切地表述,且易于读者之阅读了解,则需要以一定的艺术手法,精心结撰、熔铸剪裁、遣言造语,使之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保持思理的周密与通贯。而阅读文章,其实是一个“披文以入情”的过程,通过阅读文辞来理解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也是一个借助于他人的思维逻辑、思维方式而训练、培养自身思维的过程,从而养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题的能力。因此首先需要掌握基本的文章体制规范,其次则要有比较强的语言文字穿透能力,了解文字的内在意旨所在。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提出了“六观”之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官商。

即阅读文章,要从六个方面考察:一要看文章通篇之体制安排,是否符合基本的文体规范;二要看辞采的运用;三要看对前人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四要看作品风貌是奇是正,即作品风貌是沿袭传统还是有新变出奇;五要看文章的内容、成语和事类的运用;六要看文章语言的声韵是否谐畅自然。如果能够从这六个方面全面考察,那么文章的优劣也就显露出来了。因为作家创作文章之时,内心感情有所激动然后发而为文辞,而文章的读者则须由阅读文辞,进而了解作者的情志、思想。因此,沿着外在的形式风貌而探究内在的情志,即使是幽深的思想内容也一定能够显露出来。

汉语言有其独特性,文字乃形音义之集合体,一方面能够形成骈俪之偶对之美,另一方面,文章则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

所谓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褒贬、情感色彩,也包括语句中字形的繁简之相间、同一偏旁字的避免过多重复,使之错落有致,间隔有度。在《文心雕龙·练字》中,刘勰提出了一条原则: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诡异,指字体奇特怪异,如曹摅诗:“岂不愿斯游,褊心恶𦣻𦣻。”𦣻𦣻,读 xiōng náo,即喧哗。诗的意思是说难道是不愿意参加此次游玩吗?只是我狭小的内心讨厌那喧闹声。用“𦣻𦣻”两个怪异的字,就妨碍了对诗句的理解。更有甚者,用了许多怪异偏僻字,使人无法读解。联边,是指偏旁相同的字连用。如果实在不能避免,则最多联边字用三个。重出,就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这样便于语言的谐畅自然,如果两个字都是必要的,则宁可重复。单复,就是字形笔画的多和少。笔画少的字组成句子,就显得稀疏而字行不美观;笔画多的字堆积成文,



则显得暗淡而全篇无光。善于斟酌用字的,交错搭配笔画简单和复杂的字,就能够做到错落有致、连贯如珠了。这四条原则,不一定每篇都有,但作为写作应该掌握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注意的,这样则易于形成语言文字的错落有致,易于获得审美的享受。

声文是指文字的声韵谐畅。文章的声律,乃本于人的语言声音有高下疾徐之不同,自然而然形成。因此可知,乐器是模仿人的发声,并非人的发声在仿效乐器的发音;而语言是文章表达情志的关键,发出声音合乎音律,靠的只是唇吻而已。文章声律应该注意四声(平上去入)之交替和谐,如果声律不协调,读起来不顺口,就好似作者患有口吃的毛病。刘勰提出了一个声律和谐的原则:“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即不同声调需要相互配合交替,同韵字则需要不同的句尾相呼应,这样就能够使得声韵和谐流畅、朗朗上口。韩愈所提出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就是指受内在情感的激荡,文章之语言文字的声律与人的内在情感相呼应,而有自然谐畅之美。

情文,乃指人的喜、怒、爱、恶、惧的情感表达。其实,形文、声文乃是为表现情文而服务的;另一方面,对情文之体味周到深切,也能更好地表现形文和声文。形文、声文实际上即体现了文采的主要特征,用来修饰语言;而语言的巧妙华丽实乃源于真实的情性,因而形文、声文皆在于有力地表现情志内容(情文)。刘勰说: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喁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就是说,描摹物象,状写气韵,与外物本身相符合,而遣辞造语,注意于形文(辞语的感情色彩)和声文(语言的声律),也要与内心的情志表达(情文)相协调。可见,形文、声文、情文确实能够体现汉语言之美。

诚然,文章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交流思想、传播文明的伟大作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有怡情悦性、陶冶情操的功能;而中国古代文之起源甚早,文体多样,又有骈文、散文之分。因此,熟悉各类文体的基本特征,从汉语言之形文、声文、情文的特性入手,以“六观”为准则,披文以入情,以良好的语言文字修养,很好地理解文章之情志、思想以及文学之美,进而学习文章的写作,提高文字表达能力。



五代末期,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结束五代割据、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全国。宋朝虽然“积贫积弱”,不及汉唐富强,但政权统一,文化兴盛。宋王朝扩大科举考试的录取限制,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又广开言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赵匡胤立“戒碑”,特别强调“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且告诫后代,“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稗类抄》卷一)。这样,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士大夫文人关心国事,参政议政,蔚然成风,对宋代文章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遂使宋代成为中国散文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

宋初文章,沿袭晚唐五代虚浮华丽的骈体文余习,以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为教本,学习揣摩,注重对偶、声律,秣辞丽藻,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而柳开首先倡导学习韩愈、柳宗元文章,主张以道为本,文以致用,反对浮靡,但又以文为末,比较轻视文章的艺术性。柳开的倡导虽有批判不良文风的积极作用,但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和创作实绩,尚不足以振起一代。其后,出身寒微的王禹偁能够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形成进步的文学思想,主张文章应该“传道明心”,取法韩、柳,学习其“文从字顺”,平易浅近的文风。而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台阁文士追求雕章丽句的诗文,编成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与诗风一致的骈文亦称“西昆体”。“西昆体”风行文坛三十余年,几乎淹没了柳开、王禹偁的散文新风。

开启宋文新变者乃欧阳修。范仲淹是朝政改革的中心人物,要求兴复古道,改革弊政,“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促进教化风俗的敦厚淳朴。而欧阳修在政治思想上与范仲淹一致,他在文学上掀起古文运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居士集序》),培养人才,促进诗文革新和政治改革。欧阳修认为,所谓“道”,就是日常生活百事,引导士人关心现实民生,主张文以明道——文学是关系日常生活、社稷民生的,将“道”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并且认为道能充实文,但道并不能代替文;而且,欧阳修在提倡学习韩、柳散文的同时,也并不排斥骈文,积极汲取骈文叙述委婉曲折、精切详尽、语言精美、声韵和谐的优点,创造出一种新的文风。苏洵评论欧阳修文章:

执事之文,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能够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曲折委婉的叙述与容与娴雅的态



度自然结合,旺盛的气势和平易淡雅的文字相融合,文章极富逻辑力量,结构严谨,情韵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欧阳修与其同道苏舜钦、苏舜元、梅尧臣、尹洙、尹源等致力于古文运动,而且亲自选拔并培养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人才,从而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推动了宋代散文的繁荣。

苏轼乃继承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扩张古文运动的成果,使之日益深入人心。苏轼继续批判浮艳、艰涩两种不良文风,主张应该学道以通万物之理,达到了然于心、成竹在胸——对事物有深切详尽的认识,然后通过语言文辞,将胸中之物象、事理全然表达出来,从而写成文章。因此,苏轼提倡“辞达”,他说:

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

事实上,苏轼文章将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融为一体,直抒胸臆,真率自然: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

苏轼的文章,达到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成就。苏洵文章,有战国纵横家纵横捭阖、雄奇劲健之风;而苏辙文章,“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亦能独树一帜。苏轼还培养了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号称“苏门六君子”,文学成就虽不皆在散文,但其散文创作亦颇可注意,有力地推动了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

“靖康之难”致使北宋覆亡,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小朝廷偏安杭州,拥有江南半壁江山,史称南宋。南北宋之交,面临国家危亡,宗泽、李纲、岳飞、虞允文等奋战于抗金第一线的人物,创作出充满爱国激情的散文。此后,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等,皆能追随北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诸大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代表新时代特色的激昂慷慨之文,悲慨激越、情感真挚,笔势浩荡,论事析理,切中肯綮,感发人意。

道学是宋代的主要哲学。道学家论文,不同于文学家。北宋与欧阳修同时的

